

唐宋八大家筆記文選

江蘇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笔记文选

浦金洲

江苏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笔记文选

浦金洲

责任编辑 徐中文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海 门 印 刷 厂
(海门解放中路75号，邮政编码：2261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92,9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343—1056—3

G·927

定价：2.75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唐宋文占据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其中唐宋八大家文，更是大放异彩，影响深远。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八家。明初，朱右选辑了韩、柳、欧、苏等人文章为《八先生文集》（此书失传），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古文家唐顺之取由周到宋的文章辑成《文编》，其中唐宋文亦仅取上述八家。稍后，茅坤本朱右、唐顺之的见解，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书旧时广为士人诵读，唐宋八大家之名，因以流传开来。

八家文倡行古道却意在矫正形式主义文风之弊，归宗六经，而又面向现实。其内容广阔，体裁多样，技法新颖，语言精纯，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中的杂文（包括笔记文），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学的迂腐气息，而题材的社会化，情节的生活化，构思的情趣化，篇幅的集中化，文笔的灵活化，前所未有的，与现实及人生有了较紧密的贴近，其直接的观照与反思也不乏其篇，构成了八大家文的闪光部分。现就各家杂文的思想内容和主要艺术特色作一概括介绍。

韩愈的杂文是在“不平则鸣”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的。其中，或写自己的困顿处境，或叙友人的不幸遭际，或借助于马、龙、麟等动物形象来鞭挞现实，广泛地表现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压抑的痛苦和不平的呼声。

在《进学解》中，韩愈精心刻画了贫愁潦倒的“国子先生”的自我形象。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可谓兢兢业业，忠于职

守。然而他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甚至过着“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清苦生活。其态度与待遇的对比，已见作者的不平之气，而国子先生竟故作庄严说教，以引来学生不留情面的嘲弄，则更显其先生乃至作者难以启齿的苦痛。其《蓝田县丞厅壁记》描写的是有文学素养和政治抱负而因言事遭黜贬为县丞的崔斯立这一失意者的形象，他在位无权，当问而不能问，还要受尽屈辱，时遭讥讽，现实粉碎了他一显身手的美梦，在既“噤不得施用”时，不禁喟然叹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这不仅反映了被压抑之士的强烈呼声，也揭示了吏政中的严重问题。

韩愈的杂文善于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美刺社会的弊端。其《送李愿归盘谷序》展现了两种对立人物的生活图景：一种是以李愿为代表的隐者，他安于“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的清贫生活，惟道是守，洁身自重；另一种是官场中那些善于逢迎的官僚政客，他们“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噤，处秽污而不羞”，惟利是图，鲜廉寡耻。两相映照，美丑毕见。

韩愈的杂文往往因事而发，直陈己见，钩沉古道，呼吁正义。

在《杂说四》中，他以千里马为例，强调识马人伯乐的作用，并为千里马经常被埋没的现象鸣不平，从而间接地控诉了封建统治者践踏人才的罪行。在《讳辩》中，韩愈则以伯乐自居，向社会推荐他所发现的年轻而有才华的诗人李贺，并为他因父名晋肃而不得举进士的处境呐喊，充分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反潮流精神。

此外，《毛颖传》、《送穷文》等篇，也是韩愈杂文中的名作。这类文章感情充沛，形象鲜明，笔酣墨饱，曲折尽意，又往往寓庄于谐，极嘲讽戏谑之能事，充分体现了韩愈“不平则鸣”

的思想。

与韩愈文相较，柳宗元文“褒贬讽谕”的特色则极为明显，其形式更活泼多样。

柳宗元的杂文最富于创造性的是运用寓言故事，针砭现实。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已被广泛用来设譬，但情节比较简单，仅仅作作为文章论事说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柳则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将寓言片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著名作品有《三戒》、《螾蜃传》、《罾说》等篇。

《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组成。文章借助麋、驴、鼠得意忘形的种种丑态，以及它们终归毁灭的命运，谴责世上那些“似其事”的有恃无恐、伺机行暴的反面人物，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在《螾蜃传》中，竟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小虫螾蜃立传。螾蜃的特性是食物善负，是个要物不要命的典型。它“行遇物，辄持取”，一直压到“蹶仆不能起”才止。当行人见而怜之，为它去掉背上积物时，它旧性不改，一旦“能行，又持取如故”，丝毫不吸取教训。同时“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表面上是在为螾蜃作传，实际上是在为社会上某些类似的丑恶人物画像，笔锋直指社会上那些追名逐利死不改悔的“嗜取者”：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惟恐其不积。及其息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已病矣。

《罾说》写一个善于“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者因卖弄技巧而为罾所食的故事，讽刺社会上那些无真才实学而一味靠“吹”来欺世盗名者，指出“不恃内而恃外”的人，最终必然会原形暴露，甚至要遭到毁灭的结局。这类寓言篇幅短小，故事完整，形象生动，类比贴切，笔锋犀利，充分发挥了寓言文的“讽谕”作用。

柳宗元善于选取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物入题，因小见大，发人深省。如《哀溺文并序》，写的是一个不愿丢掉腰中

千钱的善游者最终溺水而死的故事，哀的是上层社会中那些“大货之溺大氓者”的“愚之甚，蔽之甚”。言外见意，主题深刻。在《鞭贾》中，既揭露了贾者饰鞭诈骗的行为，也讽刺了因愚昧无知而解囊购鞭以至自食恶果的富家子，但文章并不停留于此，进而将矛头指向那些“捭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的尔虞我诈的官场中人物，对他们“空空之内，粪壤之理”的腐朽本质，给予无情的抨击。指出这些人窃居高位，居无事之时，尚可自鸣得意，若一旦遇事，就要暴露原形，招致灾祸。

柳宗元的部分杂文，还针对社会弊端，就事立论，直抒己见。在《送薛存义序》中，郑重其事地就官与民的关系大发议论，他明确提出官与民应是仆与主的关系，并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官吏盗民的社会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敌戒》中，柳宗元运用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敌人的存在既是坏事又是好事的道理，并博引前代史实加以论证，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统治者“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错误思想。《永州铁炉步志》，则就地名“铁炉步”而“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这一名实不符的现象生发议论，批判社会上那些夸耀门第，以“负其姓而立于天下”的“冒名”者；对于世人不求名实，亦“且乐为之下”的不良社会风气，表现了沉痛的感慨；并鞭挞了历史上那些“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的昏王，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表现了这位政治革新家的惊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有时，柳宗元又以个人遭际为题，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在这方面，当以《愚溪诗序》为代表。作者居冉溪，因“以愚触罪”，故将冉溪改名愚溪。于是溪上诸景皆冠以“愚”字，如愚丘、愚池、愚亭等。柳宗元在文中，极力把自己写成“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的“真愚”，实际上正显示了他“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的本色。因而又寓理于事，写出了溪之愚与

人之愚的真实情态：“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物，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这样就豁然开朗，把“愚”的本意宣泄无遗了。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也同样借山水景物抒写郁愤。他把永州的奇山、怪石、嘉树、山泉，说成是“类智者所施設”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这里又以“贤”自居，正面抒发自己受辱的不平之音。

综上所述，韩愈、柳宗元的杂文，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内容广阔，形式多样。它“言之有物”，感情激切，嘻笑怒骂，涉笔成趣，犹如匕首投枪，“锋利而切实”（鲁迅语），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并且直接影响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讽刺小品的创作。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杂文，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又别具其风貌。

宋代理学盛行，统治者借此箝制人们的言行。若与唐代相比，不象唐人那样锋芒毕露。他们为文强调“义理”，务于求实。因此，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人的杂文，在内容上长于说理，因事入议；在表现形式上则咨嗟怨叹，委曲深婉。

他们的杂文，正视社会问题，强调批判精神。欧阳修的《非非堂记》，是其早期作品。当时官场空气沉闷，噤若寒蝉。因为：“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欧阳修告诫自己“宁讪无谄”故以“非非”名堂，表白自己在仕途中将静察世事、以非为非的政治志趣。《憎苍蝇赋》，则是托物寓意，将苍蝇的“终日营营”，比作“谗人之乱国”，揭示其“可嫉而可憎”的丑态，表现作者嫉恶如仇的“非非”精神。曾巩在《送蔡元振序》中，也借送友人赴任之机，陈述不能“同守之同”而“舍己之是”，对政事应敢于直言的主张，强调为官者应以“义”为准，表现作者对“今四方之从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的腐败吏政的不满心情。

他们的杂文重视修身学道，发人向上。欧阳修有《杂说三

首》，写其夏夜坐于树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或借星殒于地化为恶石的自然现象，联想到人生世间应该“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使之昭然于世，而不能为“利欲”所牵；或借日月星辰运行不已的伟大作用，联想到人之君子应“自强不息”，以承担历史所付予的重任。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伤仲永》、苏轼的《日喻》诸文，都从不同角度由事入理，强调人们在成长道路上，应具有“自强不息”、勇于实践的学习精神。又如苏轼的《书刘庭式事》和《黠鼠赋》：前者写密州通判刘庭式及第之后誓取盲女、不负初约与之偕老的义行，热情地赞颂其忠贞专一的高尚情操，将其树为楷模；后者写自己从鼠狡猾善变中受到启示，认识到“望道而未见”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乃至危险性，从而提高了自己观察世事的主动性。

他们的杂文在抒写失意境遇时，通常以旷达出之，形成迂回婉曲、情在其中而意在言外的风格。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曾巩的《醒心亭记》、苏洵的《木假山记》、苏辙的《东轩记》和《黄州快哉亭记》等篇。苏辙还有篇《孟德传》，写逃卒孟德进入深山因不怕虎、虎不敢食的故事，并称赞他是位“有道者”。苏轼读了此文，又写一篇《书〈孟德传〉后》，叙述他始而疑、终而信的认识过程，并且补充了几个实例。苏轼兄弟不惜笔墨，大谈人与虎的关系，正寄寓了他们处于逆境之中，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待各种打击毫无畏惧的旷达胸怀。苏轼的《猪肉颂》，则以诙谐的笔调，写其居黄州贬所时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其中，自然也蕴含着作者内心的不平之慨。

宋代古文运动建立了平易畅达的文风，便于叙事、说理、抒情。正如朱熹所说：“欧公文章及三苏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朱子语类》）因之，随笔体盛行一世，再现风俗人情、物理世态的文章往往结集而传天下，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的《归田录》和苏轼的《东坡志林》。前者是欧阳修晚年知亳州时

所作。卷中杂录了朝廷遗事与文人琐谈，不仅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而且部分篇什还有史料价值。它叙事翔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某些风貌。后者非一时一地之作，乃后人所辑。它记录了苏轼自黄州直至海南年间的特定生活情景，如《记承天夜游》、《儋耳夜书》等，信笔挥洒，皆得神趣。

唐宋八大家杂文、随笔的创作成就极其辉煌，它为文坛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后世的讽刺小品与笔记文的创作，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为了反映唐宋八家文的主要成就，并在批判继承中取得有益的艺术借鉴，特以杂文、随笔为题，编选了这个通俗的注本。在入选篇目的数量上，按各家的实际成就而有所侧重。其中，突出了韩、柳、欧、苏（轼）四家文的分量，总计入选文章八十七篇。

古人文集分类较宽。本书杂文选目，有采自杂文、杂著之类，有采自赋、对、传、骚、箴戒、题序、记、书诸体。总之，从内容上着眼，以杂感为依据，取其思想性、艺术性结合甚好的作品。随笔选目较为单纯。欧、苏随笔，分别从其随笔体《归田录》与《东坡志林》中撷取，并注意入选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

本书的前言，意在从总的方面说明唐宋八大家的杂文、笔记文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以及八大家杂文、随笔的主要成就、文风异同等等。在每一家的选文之前，对作者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成就，作一简明介绍。在每篇正文之前，有简要说明，对文章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作必要的提示。注释部分，力求简要准确，符合原意。本书选文，均从校勘较完善的通行本中选录，篇末注明版本出处，便于查核，重要异文，在注释中说明。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与汲取了前人与今人的部分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在图书资料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得到了祖保泉师的具体指教。南京师范大学金启华教授与江苏教育出版社徐中文同志对本书的编选与出版，都赐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唐宋八大家的杂文、随笔，过去为封建统治者和具有正统儒学思想的人所鄙视，在一些选本中往往弃而不录。因此，本书从杂文、随笔角度选注八大家文，这还是一次新的尝试。由于自己水平不高，阅读资料有限，在编注说明中，还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热忱地希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浦金洲

1985年12月于安徽师大

目 录

韩 愈

子产不毁乡校颂	3
杂说四首(选二)	5
龙 说	5
马 说	7
获麟解	8
择言解	10
进学解	12
讳 辩	19
蓝田县丞厅壁记	23
画 记	27
送李愿归盘谷序	33
毛颖传	38

柳宗元

牛 赋	47
贻骥传	50
蠹 说	51
哀溺文(并序)	53
对贺者	56
敌 戒	59
三戒(并序)	61
师友箴(并序)	64
鞭 贾	66
读韩愈《毛颖传》后题	68

送薛存义序·····	72
愚溪诗序·····	75
永州铁炉步志·····	78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80

欧阳修

秋声赋·····	88
憎苍蝇赋·····	91
醉翁吟（并序）·····	96
杂说三首·····	98
六一居士传·····	101
记旧本韩文后·····	105
非非堂记·····	108
养鱼记·····	110
送杨真序·····	112
送曾巩秀才序·····	115
归田录（十则）·····	118
但以实告·····	118
太宗取士·····	120
卖油翁评射·····	121
宋郊改名·····	122
寇奢杜俭·····	123
面似靴皮·····	124
马上枕上厕上·····	125
夫妻善对·····	127
吕蒙正不为物累·····	128
物类相感·····	129

苏 洵

木假山记·····	133
-----------	-----

名二子说·····	135
与梅圣俞书·····	137
与欧阳内翰第四书·····	139
老翁井铭·····	143

曾 巩

醒心亭记·····	148
墨池记·····	151
鹅湖院佛殿记·····	153
赠黎安二生序·····	155
送蔡元振序·····	158
荔枝录·····	161

王安石

伤仲永·····	167
同学一首别子固·····	169
游褒禅山记·····	171
送孙正之序·····	175
扬州龙兴讲院记·····	178
读《江南录》·····	180

苏 轼

黠鼠赋·····	187
稼说送张琥·····	191
日喻说·····	193
书刘庭式事·····	195
书《孟德传》后·····	198
墨君堂记·····	200
传神记·····	203
李氏山房藏书记·····	206
书柳子厚《牛赋》后·····	209

前怪石供·····	211
猪肉颂·····	214
东坡志林（七则）·····	215
记承天夜游·····	216
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216
记六一语·····	217
记游庐山·····	218
儋耳夜书·····	221
东坡升仙·····	222
论贫士·····	224

苏 辙

孟德传·····	227
东轩记·····	230
黄州快哉亭记·····	234
遗老斋记·····	238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241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他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不久，其兄韩会死于韶州贬所，乃“从嫂归葬河阳”（《祭十二郎文》）。当时中原动乱，全家又“就食江南”，寄居宣州。据《新唐书·韩愈传》载：“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贞元八年（792）举进士，初入地方节度使幕府，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因上书言事，数次遭贬。历官国子祭酒、京兆尹、吏部侍郎。其郡望昌黎，文中每称“昌黎韩愈”。因而人称“韩吏部”、“韩昌黎”。有《韩昌黎集》。

韩愈一生崇尚儒学，排斥佛老；提倡仁政，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同情被压抑之士，提出“不平则鸣”说。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等级制度，又暴露了思想上的落后性。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贯以恢复古先王之道和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为己任。他联络友人，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意在“大拯颓风，教人自为”。对于他的行动，“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然而“先生益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韩愈虽号复古，但在散文创作上实际是革新。他提出了作文应遵循的一些标准，其中主要的是以实事为依据，即“因事陈辞”、“辞事相称”，反对空言；主张语贵创新，做到“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剽窃；要求“文从字顺”，反对艰深晦涩。此外，韩愈还向作家提出内在修养的问题。认为“根

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答李翊书》）。因此，他告戒其门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即在根本上一番刻苦的功夫。韩愈还以与其创作相适应的散文创作实践，在中唐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新文体。

韩愈的文章，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运用自如，写下许多优秀的篇章。在论说文中，以《原道》为代表，集中地表达他尊崇儒学、排斥佛老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古先王之道“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因而以继承道统自任。他将长期仁义不兴、人民困苦的原因，归之于佛老的流行，因之大声疾呼地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说得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在记叙文中，以《张中丞传后序》为代表。韩愈从尊重史实出发，夹叙夹议，极力为张巡、许远辨诬，描绘出这些视死如归、肝胆照人的爱国者的英雄群像。文中明确指出：当安史叛军南犯时，“弃城而图存者”有之，“擅强兵坐而观者”有之，然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以千百就近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可是乱定之后，时人不去追究那些弃城而逃和观望者的责任，反而“责二公以死守”，真是“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语言锋利，气势逼人。在抒情文中，以《祭十二郎文》为代表。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京，其侄老成意外地病逝宣州。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悲痛欲绝，含泪写下这篇“千年绝调”的祭文。文中从父兄早逝、家道维艰、就食江南、叔侄相依写起，历叙生前琐事，痛定思痛，呼号无及，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韩愈一生宦海浮沉，饱尝压抑之苦，故其文章广泛地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痛苦，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不平则鸣”的思想，是其精华所在。

韩愈的文章，不论说理、叙事、抒情，或长篇，或短制，总